

# 何去非的选择与宋朝社会时尚

陈 峰

在北宋神宗朝，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考生曾先后六次科考落第。何氏虽屡挫于科场，但却饱读兵书，精于论军谈兵。元丰五年，何去非以特奏名的特殊途径中式。特奏名为北宋科举中的特殊措施，即对屡次落第的举子予以照顾，允许通过省试而参加殿试。在殿试过程中，宋神宗发现了这位举子的兵学特长，颇为欣赏，便问他可否出任武职官。按说这正是考虑学有所用的安排，但对何去非而言却是一次艰难的抉择：如果拒绝皇帝的“圣意”，可能会遭到黜落，甚至不可预测的下场；而同意天子的安排，则实非心甘情愿。最终，何去非还是因为“不敢违圣意”，被迫接受武官头衔，到中央太学附属的武学里就任教授之职。以后，又被提拔为武学博士。

说起来，何去非之所以如此为难，其原因正在于当时的社会风尚以及价值观使然。这还要从宋朝开国前后说起。

宋朝立国之前，经历了长期的藩镇割据局面，五代时更出现武夫跋扈、悍

将称雄的极端形势。一时竟有大将毫无愧色地宣称：“天子，兵强马壮者当为之，宁有种耶！”（《旧五代史·安重荣传》）这种言论无疑折杀了皇权的神圣。至于文臣，自然也要仰承武夫鼻息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浓烈的“重武轻文”风尚，世人大都视军旅为发迹要途。许多文人学子也弃文从武，如历仕后晋、后汉及后周三朝、并任两朝节度使的焦继勋，早年原本走的是读书科举之路，当看清书生可悲的前途后，他愤而发誓：“大丈夫当立功异域，取万户侯，岂能孜孜事笔砚哉？”遂毅然投笔从戎（《宋史·焦继勋传》）。

在上述背景之下，行武出身又亲自导演黄袍加身的赵匡胤，对兵变夺权那一套再熟悉不过，因此从登上皇帝宝座之日起，便采取种种举措以防他人故伎重演。于是，北宋从开国伊始就全力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方针，以重新确立天子权威，并解决长期存在的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。“崇文抑武”作为有宋一

代的治国方略大致诞生。到宋太祖朝后期，这一努力初见成效，表现在世人对待文武官职的取舍上，便出现了以文为贵的现象。

如开宝五年，宋太祖鉴于西川武将处事不当而不断引发造反的局面，考虑派遣懂军事的文臣前往管军。文官辛仲甫被宰相赵普推荐上来，宋太祖当即委任他为益州兵马都监，并将其文职改换武职，同时令辛氏进京接受考察。辛仲甫是一名文武兼备的人才。宋初，他在节度使郭崇幕府任职，曾妥善应对过复杂、危险的变故，他的箭术也十分高超。然而，辛仲甫却对朝廷的安排深感遗憾，表示：本人原是学先王之道，愿以此效力于国家，但陛下却仅考察本人的武艺。宋太祖只得劝勉

其上任。辛仲甫在完成西川任职后，终于又转回文官队列（《宋史·辛仲甫传》；文莹《玉壶清话》卷一）。

另外一方面，明智的将领们也适时调整了心态，对文官士大夫们采取了恭敬的态度，这其中尤以曹彬最为突出。据记载，曹彬虽居枢密使的高位，但在与文人交往中却表现出谦卑的姿态，如他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车马，都“必引车避之”（《宋史·曹彬传》）。一位

粗鲁的禁军统帅党进，尽管不通文墨，却不顾闹出笑话，也要效法文臣上朝的语调。这些极端化的举动在以往历史上实在罕见，而其之所以产生，正是当时社会风尚逐渐转变的产物。

宋太宗称帝后，由最初的防范威胁皇位考虑，到两次北伐失败后采取的



宋太宗像

“守内虚外”的政策，都加深了对军事将领群体的压制，“崇文抑武”方略遂得到进一步的推行。因此，从大到重用文臣、推崇儒学、提倡科举，小到奖励文翰，无不体现出政府的崇文抑武导向。如：宋太宗即位仅两个月，就亲自主持科考，录取进士以下500多人，大大超过以往的规模，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。但宋太宗“方欲兴文教，抑武事”，对反对意见未加理睬。一时

间，武臣们在政坛上黯然失色，不仅其地位远低于文臣，而且其精神更趋于萎靡。这种局面的存在，就连当时一些清醒的文官都觉得不正常。

如端拱二年，文坛俊杰王禹偁在上奏中指出：自陛下统御以来，“力崇儒术”，文人学子仕途畅顺，动辄受赏，而披甲之士则不免受到冷遇。希望能“减儒冠之赐，以均战士之恩”。科举出身的王禹偁甚至提出了“抑儒臣而激武臣”

的激进主张(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十)。透过这些议论,不难看出当时文臣与武官之间地位的悬殊。清代思想家王船山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宋所忌者,宣力之武臣耳,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。”(王夫之《宋论》卷二)

到北宋第三位皇帝真宗朝及其以后,以往两朝执行的“崇文抑武”方略已经被奉为圭臬,全面深化。于是,武夫备受压制和歧视。据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亲眼所见,某日枢密院二人在皇帝面前议事,颇有见地的武臣马知节与文官王钦若发生争执,王钦若竟喧哗不已,马知节只能委屈涕泣。(王素《文正王公遗事》,齐鲁书社,1997年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)宋仁宗朝,名将狄青进京赴任枢密副使,被文人们贬称为“赤枢”(当时军人有“赤老”的蔑称)。由此可以窥见当时武官所处的低下地位。

正是“此一时,彼一时”也。曾几何时,武人们为所欲为的岁月痕迹尚依稀可见,北宋统治者已将文官推到了社会的前列,所谓“满朝朱紫贵,尽是读书人”。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转变,不仅昔日令人鼓舞的“以战斗博富贵”、“投笔从戎”的理念遭到抛弃,而且社会风尚以及民众骨子里原本具有的尚武精神也日渐淡薄,因朝廷“崇文抑武”而引发的民间“重文轻武”观蔚然成风。在此形势之下,文官便羞于与武人为伍,更不愿转为武职。从宋代的文献记载中,不难看到大量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和具体实例。

宋太宗即位初,割据两浙的吴越王举国归宋,其子钱惟演依照惯例被授以

武官之职。但钱惟演不甘心于武人身份,向朝廷献上诗文,请求转换文职,后终于如愿以偿。

宋真宗咸平年间的状元陈尧咨,不仅文辞出众,而且以射术闻名一时,博得了“小由基”的佳号。“澶渊之盟”以后,宋真宗为了应对能骑善射的辽朝使臣,也打算在朝臣中寻觅既善射又威武者。陈尧咨自然就被推荐上来,宋真宗有意让他转为武职,并许诺可授以节度使之衔。在当时,节度使不仅是武官最高头衔,而且俸禄也优于宰相。但在陈母的杖责之下,陈尧咨谢绝了这个可能使他蒙羞士林的官位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也成为以后许多戏剧表演的内容,被广为传颂。不过,到宋仁宗登基初,陈尧咨因得罪执政大臣,结果突然被改为与本官地位差不多的武职,打发到地方衙门。这显然属打击报复行为,陈尧咨对此强烈不服,可拗不过垂帘的刘太后,无奈只得屈从。

宋仁宗在位初期,翰林学士承旨李维因在使辽期间做诗用语不当,受到抨击,仕途遇挫。心灰意冷的李维,主动要求改换武官,遂出为相州观察使。不料,此事引起一片非议,甚至有言官弹劾这是一种不顾廉耻的行为。当时的观察使虽名不显,更无权,但俸禄却不薄,远优于翰林学士承旨的收入。这种俸制规定是宋初收兵权时给武将的一点经济补偿,所谓“厚其禄而薄其礼”。所以,身居清华之位的李维在仕途受阻后转求观察使的举动,虽在情理之中,却不免遭到文臣的蔑视。

最突出的例证大概莫过于宋仁宗朝

四位名臣的举动。庆历中，范仲淹与韩琦、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。也许是出于鼓励士气的考虑，宋廷突然下令，将四位文官统帅的文职同时改属于武职。范仲淹首先上书坚辞不就。随后，庞籍和王沿也上表“不肯拜”。当时惟有韩琦勉强接受，但在给天子的书信中表达了忍辱负重之意。由此可见，即使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范仲淹，也不愿身披武官的外衣，即使他实际上是在指挥作战的。不久，宋廷只得恢复四人原来的身份。

回到本文开始讲的何去非，联系到他所生活时代的社会风尚、价值观，我们便可以理解他的为难之处了。

宋哲宗元祐四年，苏东坡给皇帝上了一道《举何去非换文资状》的奏书，说自己与何去非相识后，认为其学问与见识高远，有补于世。又反映何氏虽喜

论兵，但本人原是儒者，“不乐为武吏”，因此建议允许他转换文官，仍做太学博士。然而时隔一年，到杭州做官的苏轼了解到何去非虽转为文职，却被差遣到徐州任地方州学教授，地位明显下降。于是，苏东坡再次上《进何去非备论状》的奏文，为何氏鸣不平，希望朝廷能重用这样的有用之才。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二九、卷三一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版）从有关文献记载可知，以兵略见长的何去非最终不过做到州通判的地方官。

近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翻检有关何去非其人其事的资料，很清楚地发现此人属于古代兵家类人物。其所著《何博士备论》、《司马法讲义》及《三略讲义》等兵书，虽然无法与《孙子兵法》等量齐观，却也不乏新见解、新理论，足以说明作者具备了丰富的军事知识素养。但问题是，兵学本是实践性极强的学问，纯粹的纸上谈兵意义毕竟有限，如先秦的孙臆和吴起、唐代的李靖等著名军事家都出入过军旅沙场，在实战经验的基础上著书立说，才流传下千古名篇。而何去非却没有效法这些名将所为，不仅没有真正投军，亲身经历战争场面，检验那些兵家理论，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抱负，而且连武官的外衣也不愿披上，终究难以割舍的是那份对文官身份的迷恋，因此他只能困顿于学堂与地方衙门之中，埋首书案，在精神世界里体验刀光剑影。就其个人际遇而言，固然可悲、可叹，就时代而言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剧呢？

（作者单位：西北大学文博学院）



铜庐县富春山麓的范仲淹雕像